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丛书



MISSION AND ROOTING

传播与植根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章开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丛书



MISSION AND ROOTING

传播与植根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章开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章开沅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18-04923-0

I. 传… II. 章… III. ①基督教—研究—中国—文集②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集 IV. ①B978—53
②G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012 号

责任编辑	倪腊松 崔肇钰
封面设计	卢小雅 + 何 筠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4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923-0/B·158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电话:020-83795749)联系调换。

章开沅

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26年生。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1992年获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该校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张謇传》、《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实斋笔记》、《鸿爪集》等。

自序

人们常说岁月如歌，我却往往感到岁月如梭。即以自己决定转向基督教史研究而言，不知不觉已经度过了二十个春秋。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与威尔逊两位教授联袂来访，建议我从事并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其情其景仿佛就在昨天，而挚友子健离开人世已逾十年。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二十多年并没有蹉跎岁月，在许多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不仅教会大学史研究成果累累，而且整个基督宗教史研究也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一可喜趋势看来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其实，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想法原本较为简单，无非是想从文化史、教育史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借以弥补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这块空缺。及至1990年再次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耶鲁、加州（UCSD）等校任教并合作研究，这才深切感到，如果研究教会大学而不研究基督教，就无异于研究某个历史人物而不研究其思想根源，特别是其深层核心部分。加以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及其后世局变幻的纷纭，更使我认识到民族与宗教乃是当今乃至下个世纪困扰世界的两大复杂问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阐释大国霸权主义如何利用这两大问题以遂其私，然而却万万不能忽视这两大问题内在的复杂性 with 相对独立性。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研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文化、艺术、教育、历史、神学等专门领域，实乃涵盖整个人类相互理解、沟通乃至和谐相处的终极关怀，因而这就更加增添了我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决心与勇气。

基督教对于中国来说诚然是一个外来宗教，然而它在西方国家





的流传究其初始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原本肇始于古代的巴勒斯坦，其后逐步传入罗马帝国并被定为国教，才较为迅速地成为世界性宗教。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基督教乃是东西方精神和历史的力量之汇合和交融。没有这种交融基督教便不可思议。这是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它有其东方的直接发源地，但它首先是以自身反映西方全部特点的西方宗教。基督教产生于人类通过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化形成统一、东方和西方彻底联合的时期。”^①基督教的传播从一开始便接受其传播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制约与影响，而其表现形式无非是通过挑战—适应而进入融合。早在公元1和2世纪，罗马统治者也曾认为基督教是犹太人的教派，并对基督教与犹太教一并加以歧视乃至迫害。但自君士坦丁大帝确定基督教为国教后，特别是从6世纪起，已经正式落户西方的基督教遂转而镇压曾与自己同患难的犹太教。不过，历代基督教神学家仍然难免向犹太教圣经学家寻求教益，即使是从希腊文化吸取营养，也不难时而显露犹太教的底色，如有些学者认为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就是弥赛亚，而道成肉身便是耶稣基督等。当然，基督教进入西方以后更多地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而首先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如柏拉图对于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诠释，亚里士多德有关存在与知识的论述等等，都逐渐渗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之中。甚至连基督教的若干崇拜仪式与赞美诗，也可以从希腊密教与神秘哲学中寻根溯源。

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确立其主流地位以后，向东亚的传播过程，同样也经历了挑战—适应—融合的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也许我们都熟知利马窦面临中国传统文化强大挑战时，明智地采取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甚至为进入上层社会而改穿儒服。其实在利马窦到达澳门33年之前，另一位耶稣会士沙勿略（P. Francisco Xavier）即已抵达日本鹿儿岛，他在日本社会传统势力挑战的面前，早已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正如戚印平所曾指出：“当传教士无法用武力或

^①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第93页。



其他手段彻底铲除这些对立面时，他们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做出自身的调整，寻找并改善某种能够被传教者理解并且接受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传教士只能委曲求全，采取某种因地制宜的权宜之计，以达到其传播福音、并使所有日本人和所有东方人改宗基督教的根本目标。”^①

但是，及至新教先驱马礼逊 1807 年到达广州，世界和东亚的整体格局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极大变化。西方强盛与东方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学东渐”伴随着殖民主义的狂潮迅速席卷亚洲。在新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在亚洲与中国的传播不再像早先那么温文尔雅。正如蒋梦麟在自传体的《西潮》一文中所曾指出：“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 19 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这段话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却朴素无华地揭示出当年西方传教士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也正因为如此，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民教冲突日益激化，各地教案连绵不绝，终至酿成两个世纪之交庚子、辛丑的悲剧结局。而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与再瓜分世界浪潮的高涨，基督教的传播仍然与殖民主义结伴东行。西方传教教士，包括那些虔诚的真正基督徒，似乎并没有从历次教案与义和团等惨烈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他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再次与重新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发生正面碰撞，而且碰得头破血流。

基督教正如佛教的普度众生一样，其宗旨也是把福音传遍世

^① 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第 309 页。



界。按照中美关系史专家瓦格 (Paul A. Varg) 的看法, 可以把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一) 从十九世纪初到该世纪末, 强调尽快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正如‘在我们这一代中使世界福音化’的口号所表示的; (二) 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到二十世纪的前 25 年, 目标扩大为把所有的社会福音化, 并使个人归主; (三)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 回应中国的民族主义, 同时并把基督教解释为一种社会福音。”^① 正是在瓦格所说的第二时期与第三时期之交, 1922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 与中国人先后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与非宗教大盟形成旗帜鲜明的两军对垒, 并且迅速引发蔓延全国的反帝斗争相结合的反基督教运动, 而“中华归主”这一口号遂成为众矢之的。

“中华归主”的原文是“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亦可译为“基督教征服中国”。其含义早已被杨格非 (Griffith John) 明白表述: “作为传教士, 我们相信自己是顺服主的命令来到中国。而我们事工的目的, 是在这伟大的国家中兴起门徒或信徒。不管其他人怎么做, 这是我们的事工。我们来这里, 不是为发展这个国家的资源, 不是为促进商业, 不仅是为提升文明, 而是为与黑暗的势力争战, 为拯救罪人, 以及为基督征服中国……只有福音是神救恩的大能。而从罪的掌权中得救, 从道德与灵魂的痛苦中得救, 则是中国人最大的需要。我们深信此点, 所以委身于这最崇高的事工, 尽力把耶稣的真理向中国人显明, 并植入他们的心中。”^② 对于西方基督徒来说, 这些话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老生常谈。而在杨格非发出如此宣示 23 年以前, 当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将返回祖国时, 他的一位 (18) 54 级级友的临别赠言也有类似的话语: “上帝

① 据 Jessie G. Lutz 编, 王成勉译:《所传为何? 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Evangelists of What?) 台北国史馆, 2000, 第 16 页。

② 杨格非 1877 年在上海宣教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与我们事工相关的圣灵》的演说词, 转引自《所传为何?》第 46 页。



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同时赐给你绵长而愉快的生活。”^① 耶鲁的年轻大学生不仅嘱托中国级友把基督福音带回这古老的异教帝国，而且自己也关切乃至投入这一灵性事工，其结果便是在19世纪末自行组织耶鲁布道会，前往华中地区传播福音并创办学校医院。

但是这些普世性宗教话语，特别是出诸西方人士之口，当初却很难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上帝对于中国人仍然还是一个外来的“主”，“归主”与“征服”则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乃至民族尊严，而且很容易被理解为西方人的僭妄乃至殖民主义的张扬。所以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徐宝谦在1939年极为坦率地指出：“基督徒常喜欢采用军事的术语。1922年，一本调查报告被取名为‘基督教占领中国’。其他人士或许会用‘基督教征服’的字眼。现在我们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必须说，虽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基督教占领了，但她从未被征服过。对此失败，必有其原因。”他认为这个原因，“即是整个方法的错误，其根源在于对基督教思考不够周全。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在精神、目的，以及在方法上都绝对如此。爱的宗教不能用武力传布，方法与目的必须是一致的，否则会引来悲剧性的失败”。当然，基督教在华传布并非是完全的失败，所以他又指出：“为什么基督教没有遭到更大的失败？原因即是凭借武力的方法并未被普遍认同，亦未被全面实施。传教士、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大多有着爱心、奉献与牺牲精神，因此能够超越或克服一般宣教事工机构的困难，为中国的宣教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尽管基督教有初期的错误与后来的兴衰，现在正稳定地成长。最新新教的调查，显示新教人口已超过五十万，而天主教则宣称有三百万。现在看起来相当确定的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生活中已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且会继续如此。”^②

① 耶鲁大学1854级档案。

② 《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第134～135页。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反基督教运动冲击下转而自我反省的不止徐宝谦一人，许多中外基督教领袖人物都认识到不应以外国武力与不平等条约为靠山来传播基督福音，传教士必须摒弃盎格鲁撒克逊与西方文明傲慢，力求平等地对待中国人（as man with man）。一种新的观念迅速渗入基督教在华传布事工，即除直接宣教福音与引人归主以外，教育、医疗、农业与社会改革等等也同样具有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明显效应。或许可以说，他们是试图把“事奉上帝”（serve god）寓于“服务社会”（serve the society）之中，而所谓“服务社会”即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在这些传教士看来，人道主义本来就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教堂不仅是传播基督福音的处所，而且也应是社会服务的中心。他们虽然确认信仰宗教只能属于个人经验，但却经常强调基督教义的社会层面，甚至主张通过新的社会与经济重建运动，形成更好的社会格局以实现基督教的价值。

这些顺应历史潮流与满足社会需要的做法，虽然在改变基督教形象并扩大其影响、增多其信徒诸多方面，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仍然没有妥善解决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两个深层问题：一是所传为何？二是由谁来传？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基督教的皈依者很难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也很难完全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生根”（rooting）或“落户”（settlement）。

鲁珍晞认为传教士大多是实践者而并非善于作理性解释的学者。“他们通常抱怨中国人欠缺罪的观念，但他们却一点都不思考基督教强调人的罪性和人依靠神的恩典，与儒家相信人性本善及人为自己命运负责两者之间的矛盾……”。有趣的是，就如同很多中国人是从传教士的活动而非从基督教的神学来评估基督教一样，传教士也趋向用他们在 19 世纪对中国乡村的观察，来判断中国伦理价值，而不是从儒家和儒教的教导来看。再者，通常是传教士拿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与中国的习俗来比较，而中国人系以孔子的伦理观与基督教的国家和个人行为来对照。一直到 20 世纪，才有很少的对



等实体的比较，社会对社会，理念对理念。”^① 长期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鲁珍晞的分析显然是客观而又平实。徐宝谦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作为对本土传统文化了解较深的中国基督徒，其表述则更为简洁：“从文化分析的观点来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甚大。基督教是采有神论的，而中国文化是人道主义的。基督教对罪与苦难采现实主义的观点，而中国人则采现象学与非玄学式的看法。基督教认为人不能拯救自己，他需要来自人类以外超自然的拯救，而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救。”徐氏并没有停留于这种比较评析，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基督教福音的本质与功能为何？其与中国文化不同之处为何？此福音是否为中国所需？我们如何使中国接受它？”^② 这是“所传为何”这个根本问题的四项重要内容。百余年来几代中外基督教有识之士曾经为此进行不断的思考，并且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但似乎很难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因而也就很难获致比较显著的成效。严重的分歧始终存在：许多传教士及其从属的差会认为“中国归主必须有中国文明的基督化，也就是西方化”；而也有一部分传教士，特别是中国传教士，始终反对这种简单的甚至带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基督化与西方化。1945年韦卓民作为亨利·鲁斯世界基督教客座教授，在耶鲁神学院发表题为《植根基督教会于中国土壤》（*Rooting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ese Soil*）的著名演讲，明确指出：“用另外一种文化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重要的事情就是首先必须进入这种文化……我们尽可能进入中国文化、社会、各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精神，看看有没有与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气味相投之处，或者那里可以找到一种不致触犯中国人的中介，用以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③ 而罗林森（Dr. Rowlinson）则在题为《基督教

① 《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第18页。

② 《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第135页。

③ 收于耶鲁神学院藏档 RG10, B34, F474。



在中国落户》(*Christianity Settles Down in China*)的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基督教尽量在新的合法基础上落户于中国，不再视为外洋事物，并将进入与华人之间的新而自由的关系。这是教会与政府现今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局面。这一变革完成以后，将使基督教合法本土化。”^①

为了中华归主，首先要主归中华。换句话说也是一样：为了中国基督化，首先要基督中国化。这是许多中外基督教人士经过长期反复内省所获致的醒悟。其实早在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会议即已明确宣告：中国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基督教，而本土化的基督教意味着中国的本色神学(indigenized theology)的形成，以及中国基督教自治、自传、自养的实现。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走过的漫长历程，如何正确处理普世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些传教士难免对佛教充满羡慕之情，因为佛教早先也曾是外来宗教，但经过四五百年的碰撞、交流、沟通、融合以后，其影响力已经渗透于中国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而中国遂成为扩展发扬佛教思想、学术乃至创立源远流长的重要宗派的发祥地之一。当然，基督教也不必自叹生不逢辰，因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真正落户必然需要几个世纪以上的艰苦的努力，而既往众多中外基督徒的坚毅奋进也并非没有历史上留下痕迹。我始终相信海格斯芮夫说过的那段话：“宗教运动必须具有本土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意义，也要采用传统的方式。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于本土文化内部，它自然企望传播、示范这些观念、价值和方式。如果它是从外面介绍进来，它必须使之便于本土理解，否则便要费力重新解释才能使之成长。”^②其实，有两位已故美国基督教史学者早已有此看法。一位是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他

^①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VII, 1937Sept, p. 542.

^② David J. Hesselgraved, *Dynamic Religious Movement—Case Studies of Rapidly Growing Religious Around the World*, Michigan, 1978, p. 304.

把自己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专著称之为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in China* (基督教差会在华史), 而不是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史)。另一位是贝德士 (Miner S. Bates), 他把自己未完成的遗著称之为 *The Protestants' 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 也不敢自认为中国基督教史。他们这种谦逊而又务实的态度, 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1) 基督教在中国植根与落户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艰苦努力的漫长过程; (2) 撰写完全意义的中国基督教史, 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我们相信, 中国的基督教史研究者一定不会辜负这两位美国老师的殷切期望, 而这本习作的出版无非是略表自己的心意而已。



目 录

自 序	1
一、门外看基督教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3
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	
——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	14
世纪之思	27
学术讲座开幕词	32
二、教会大学研究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	
——以贝德士文献 (<i>Bates' Papers</i>) 为实证	37
教会大学与东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与东西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序言	64
教会大学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政治	68
基督教与五四运动	82
《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综览》序言	88
《百年树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反思》读后	97
三、走近中外基督徒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对容闳的再认识	107
先驱者的足迹	
——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	111





我对韦卓民的认识	
——《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序	126
金陵之光	
——陈裕光办学理念试析	132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	148
西文东方学报论著举要	164
巨大的流产	
——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170
西方人眼中的东亚基督教	
——以贝德士为个案研究	196
让事实说话	
——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212
“南京帮”的故事	
——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234
陶行知与基督教	252
四、贝德士藏札选录	
贝德士与费正清来往信札	259
贝德士与谢扶雅来往信札	288
贝德士与邓嗣禹来往信札	318

一、门外看基督教

